

## 主持人语：美国“人文主义”的发展与中国的渊源

---

张 源

美国“人文主义”学说创立已逾百年，其间经历了数次起落，并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一学说于20世纪初在美国诞生，代表人物为欧文·白璧德与保罗·穆尔，引起了当时在哈佛留学的梅光迪、吴宓、汤用彤、楼光来、张歆海等中国学人的关注与认同。至20年代这一学说趋于成熟，在美国本土掀起了一场“新人文主义运动”，自此进入鼎盛阶段，并开始产生世界性的影响。除法国、印度、韩国、日本等国之外，在中国之影响尤巨，“新文化运动”后期，美国“人文主义”学说经由吴宓等“学衡派”人士以及梁实秋等人的译介与阐释，进入了中国的文化语境，与其他西方观念和思潮一道参与了中国新文化身份的建设，并且通过此后中国本土的“重估”工作不断获得新的阐释形态，从而在中国持续至今的文化身份建设过程中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20年代末期，“新人文主义运动”在美国进入巅峰状态，但是伴随着1929年经济大衰退，情势很快急转直下，运动在30年代跌入低谷，“人文主义”学说亦随之销声匿迹。同时，中国《学衡》杂志于1933年白璧德去世当年宣告停刊，《大公报·文学副刊》也在1934年1月1日出版第313期后不再由吴宓担任主编，白璧德学说失去了又一个宣传阵地，梁实秋的相关推介工作亦止于1934年。此后这一学说连同其宣传者在中国遭到非学理意义上的批判达数十年之久。

二战之后，美国本土知识分子由于经历了“20世纪文化令人痛苦的道德真空”，纷纷投身于“传统与价值的再发现”之中，此时白璧德及其学说重新进入人们的视域，并在新的历史阶段进一步发展完善，这一时期阐发美国“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为白璧德的私淑弟子罗素·柯克与彼得·史丹利斯，特别是柯克的经典阐释追溯并确立了美国“人文主义”从亚里士多德到柏克再到白璧德的“道统”，柯克本人亦由此进入

了他所阐述的“道统”之中，成为美国“人文主义”传承至今不可或缺的一环。

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那个“唯我论”盛行、“十足的浪漫主义”的时代，白璧德的影响再次跌入低谷。60年代的“低迷期”过后，这一学说在七八十年代高调复苏：美国国家人文研究所成立，该所以柏克—白璧德—柯克一脉的“人文主义”为旨归与依托，组织、参与出版了一系列有关白璧德及“人文主义”学说的论著、传记、纪念文集和研讨会论文集，并主办《人文》学刊，逐期刊登白璧德“人文主义”研究重要论文，成为研究、宣传美国“人文主义”的核心机构。该所的《人文》杂志不啻是美国的《学衡》，围绕《人文》杂志出现了一批服膺白璧德学说的学者，号称“白璧德派”（Babbittians），并由此形成了以该派成员为主体的美国第三代“人文主义”学者群体，核心人物为白璧德的再传弟子、国家人文研究所主席克莱斯·瑞恩。同一时期，中国台湾（白璧德的学生梁实秋与其门生侯健）开始重提白璧德的学说，并出版了多部关于白璧德与“学衡派”的著述。

进入90年代之后，一方面美国本土对白璧德的关注有增无减，另一方面中国大陆的相关研究悄然升温，从意识形态批判逐渐走向理性“重估”，自此研究力量大增。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美国与中国的白璧德“人文主义”研究群体开始意识到彼此的存在，并积极谋求合作。2000年，克莱斯·瑞恩教授应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等“学衡派”后人之邀来华讲学，开启了“学衡派”之后中美学者间的第二次国际互动。在此后的互动中，《跨文化对话》杂志起到了核心枢纽作用，自2001年始，《跨文化对话》陆续刊登了中美学者白璧德“人文主义”研究文章；2003年，《跨文化对话》刊出“纪念欧文·白璧德逝世70周年”专栏，同年，美国《人文》学刊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合作在中国出版《人文主义：全盘反思》一书；2004年，《跨文化对话》刊出“新人文精神”专栏，同年，美国《人文》登出《白璧德影响在中国》中国学人文章专栏；2008年，《跨文化对话》刊出“谁是列奥·施特劳斯？——美国《人文》杂志专题论争文章评述”专栏，同年，美国国家人文研究所主办“白璧德：自由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纪念白璧德逝世七十五周年），首次邀请中国学者参加并做主题发言……中美学者间第二次的交流与碰撞激活了双方的历史积淀，我们由此看到，白璧德“人文主义”乃至一切学术思想的研究与评估工作，均应在更为开阔的国际文化视野中展开，如此，中美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传统和价值的再发现”才会更具成效与意义。

2012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与美国国家人文研究所合作共建中美学术文化交流单位，成立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人文研究所。以此为平台，中美双方实现资源对接与共享，两国学者多年的努力开花结果，双方的合作进入崭新的时代。美国国家人文

研究所主席瑞恩教授获聘为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并与执行主席巴尔达奇诺先生为新建成的人文研究所做首期“人文系列演讲”，讲座反响热烈，人文研究所顺利起航。本期《跨文化对话》“美国‘人文主义’专栏”共选编了四篇文章，其中两篇便系取自2012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人文系列演讲”，一篇为瑞恩的《对立的道德德性观念及其对社会和政府的意涵》，另一篇为巴尔达奇诺的《社会和谐与经济和谐的伦理/文化前提》，熟悉白璧德学说的中国学者，大概仅从篇名便可辨认出其中的“白派”话头。本专栏所选另外两篇文章《“一纸空文”之外：美国宪法的伦理核心》与《柏克的历史道德观》，作者为美国第三代“人文主义”学者、“白璧德派”中坚迈克尔·费德里希与瑞安·霍尔斯顿——用白璧德学说重估经典（美国宪法与柏克思想），以实现“传统和价值的再发现”，乃是这一派学者的基本路数。我们看到，正是通过一代代美国“人文主义”学者的阐释工作，传统（包括白璧德学说本身）始得以作为“活的传统”在当下“活泼泼地”发挥效应，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并加以反思。

正式进入专题之前，我们尚有一点说明：本期专题四位作者的学历背景均为政治学，实际上第三代美国“人文主义”学者与20世纪20年代美国第一代“人文主义”学者和中国“学衡派”相比，并不局限为“学院派”，也不局限于文学领域，而是大都活跃在政治学乃至政治实践领域。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学衡派”是一个从“文化”角度立言的纯学术研究群体。在那个呼唤“德谟克拉西”的时代，不但“文化人”纷纷参与政治，被唤醒的大众的政治意识亦空前高涨，《学衡》刻意与政治拉开距离，不啻是一种“自我边缘化”的举动。远离政治，是为了保证学术思想的自由，不过，当一种广泛的社会/文化批判学说沦为狭义的文学批评理论之后，便脱离了其产生的背景及其所要对质的命题，由此逐渐失去生命力。同样地，当“人文主义”思想在美国借助“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广为传播之时，恰是这一学说遭到曲解、创造力枯竭的时刻，当“新人文主义”作为一种运动衰落之后，“人文主义”思想却在此后新的历史时刻再度焕发出了生机。有感于此，本专题特选编美国第三代“人文主义”学者的代表性文章，以期有助于我国学界了解美国“人文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形态，并由此反观自身的“传统与价值的再发现”工作。

美国“人文主义”在今天是否依旧能够触动中国人的心灵？我们将拭目以待。